

略论新中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特征

王川 马正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城市不断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城市随着社会变革经历了初期的调整适应后,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跨越式发展,并向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现代城市迈进。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西藏城市发挥了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辐射中心和支撑点作用,成为西南边疆安全稳定的“压舱石”。这其中所蕴含的发展逻辑,是国家治理边疆,经营民族地区的宝贵实践经验,而制度性安排、机制构建是西藏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深层次逻辑。西藏城市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了新时代高速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关键词 新中国时期;西藏;城市;特征;机制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24.03.017

中图分类号 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24)03-149-010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1]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的根基与归宿,高度概括了新中国城市发展宗旨。西藏城市自和平解放以来,经过七十多年发展,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数量从少到多;城市格局以拉萨、日喀则等七中心城市为主,周边县、镇为辅;城市人口从解放初期不到百万^[2],发展至2023年总人口365万,城市人口141.92万^[3];城市产业格局形成了一、二、三产业合理分布并不断优化;城市功能除不断发展一般城市基本功能外,更一改清季以降孱弱态势,愈来愈有能力承担起国家边疆安全稳定的“压舱石”功能。

西藏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晚。何一民较早对历史时期西藏城市史作了深入的奠基性研究^[4],指出历史时期西藏城市主要表现为临水而居,依山而建,宗教因素明显,具有“高原、民族、宗教”总体特征。王川则第一次勾勒了明代建城的昌都在近代变迁轨迹,总结了昌都建城的特征^[5];王川、马正辉归纳了改革开放40年来西藏城市精神面貌及其特征^[6]。对于新中国时期西藏城市,谢伟民研究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城市发展进程,划分西藏城市发展进程为三个阶段,并提出城市规划推动了城市大规模现代化^[7]。关浩淳分析了1951-1965年西藏城镇人口变化^[8]。蒲柯竹、美郎宗贞总结了2006-2017

收稿日期:2024-06-20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西藏地区近现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VRC079

第一作者简介:王川(1969-),男,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四川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关系史。

年西藏城市区域发展,认为城市发展“单核增长极显著,呈‘中心—边缘’分布格局”^[9]。此外,庞洪伟、孔少华、王磊等对西藏城镇化扩张对于西藏城乡人口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西藏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对口支援政策的影响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0]。

整体而言,西藏城市史研究呈现三个新动向:其一,从“厚古薄今”关注历史时期西藏城市,向探寻新中国西藏城市建设规律转变;其二,从以史学为主,转变为历史学、旅游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推进;其三,从现象描绘,到向注重实证研究和数据模型深化发展。西藏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西藏旧城市如何向社会主义“新西藏”城市过渡的研究不足;新中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分期尚未达成共识;对于西藏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和机制等研究亦有待深化。

一、从西藏旧城市向建设新中国 现代城市过渡

西藏城市起源较早,而“西藏真正意义的城市”崛起,最迟则不晚于6世纪^[11]。历史时期西藏城市面貌、城市中心随着西藏地方政权更替而变化。地方区域中心在不同时段,或为适应西藏地方统一政权的统治需要而几度变化,或囿于一方割据势力而呈现地方区域多中心格局,“如统一时期的拉萨、日喀则、山南泽当等地,割据时期的拉萨、曲松、扎不让等地”^[12],并辐射四周。

清代以降,随着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建立,宗教影响成为西藏城市发展进程中迥异于内地城市的显著特征。尤以拉萨、日喀则等中心城市受宗教文化影响最为突出,宗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13],致使清、民国时期西藏城市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氛围。

清代的《卫藏通志》等典籍,记载了西藏各地的名城;近代的内地刊物如1897年上海《益闻录》都报道“西藏名卫地,有城有山有大河小水直流融会脉络贯通其四境。”“名城”有“阿里宗城”“日喀则”等,“小城不胜缕指”^[14],可见清代已将西藏城市分为“名城”“小城”等类别。清末张荫棠新政、民国初

年十三世达赖新政,推动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西藏形成了三个等级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15],是为新中国西藏城市建设的历史基础^[16]。

虽然西藏城市起源早,但是西藏城市发展较为缓慢,“是在和平解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7]。民主改革之前,西藏严重的人口生产颓势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孱弱的生产力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

历史时期西藏仅有数量较少、人口规模较小的旧城市,城市在漫长历史时期发展缓慢。1952年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基于是时西藏人口情况,提出发展西藏人口的政策思路,认为“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的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18]是有必要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则是“帮助发展人口”,推动“经济文化”进步。到1959年平叛后再次就西藏人口,尤其是宗教与人口的关系作了更具体的指示:即不反对西藏人民信教,但也提出佛教人数众多,而不从事生产的弊端,认为“喇嘛要从事生产”,才能“维持长久”^[19]。囿于客观条件,1951年到1959年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宗教因素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

面对历史时期以来兼具民族特色和宗教影响的西藏旧城市,党中央充分考虑西藏旧城市发展模式所表现出的浓厚高原、民族、宗教特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在不同时期结合具体情况对发展西藏城市作出过不同的指示。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在民主改革之后,西藏的城市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可以说,在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开创了与以往有明显差异的城市发展格局,其原因有三。

其一,随着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重建更行之有效的中央、地方行政管辖体系,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西藏城市各级机关完全取代了旧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贵族主导的各级城市旧政权。相对于绝大多数被迫依附于农奴主的旧城市农奴半农奴人口而言,此时城市居民成为民主自由的新市民,对于自身人身、生产、居住、财产自由享有高度支配权。

其二,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加强了兄弟省份间的联系,逐渐形成了对口援藏机制,推动国家城

镇化建设和国防安全协同发展。从机制层面形成了中央、地方协调,兄弟省份对口援助,不断激发内生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西藏城市发展在既有规划下不断提质扩容,向现代城市迈进。

其三,城市发展摆脱松散无序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西藏城市科学发展规划,纳入国家安全稳定总体框架之中,实现资源调配与整合的“全国一盘棋”,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升级迭代,促使西藏城市快速发展、城市总人口数量激增、城市人口比重快速上升。

该时期西藏城镇化进程是在曲折和艰苦奋斗中发展。表现为从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建藏”到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的“援藏”;由部分军民干部为建设主体,到形成全国援藏的新机制与新模式;由“输血”式发展向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为目标的“造血”式转变。

西藏城市发展不是一个独立命题,而是与高原人居环境、民族工作、国防安全、统战工作、农牧区与城市协调发展、反分裂斗争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上世纪90年代,西藏“由于区域城镇发育不完全,对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起的作用还不小,因而,完善城镇体系建设,提高城镇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是实现(西藏)经济发展目标十分重要的一步”^[20]。有学者对比研究西藏各个城市综合数据后认为,西藏已经建立起以拉萨市、林芝市为代表的先进型城市,以阿里地区、山南市为代表的中等型城市,以那曲市、日喀则市、昌都市为代表的落后型城市的发展格局^[21]。而西藏“边境县域正在从最封闭、最落后的地区,逐步演变为西藏乃至国家面向南亚地区开发开放的前沿”^[22]。总体而言,“青藏高原城镇发展(还)表现为总体落后、局部发展加速”^[23]的特点。

学界对于西藏城市发展道路选择的讨论较多,反映了西藏城市史研究的如火如荼。党和国家也在不断地优化援藏模式,进而推动西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最适合西藏城市发展的模式,营造更好的西藏人居环境。西藏的城镇化道路选择是党和国家探寻更好地建设西藏、治理西藏、发展西藏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宗教特征明显地区的具体实践;是实践与理论不断结合的产

物,呈现出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径。

基于“决定历史分期,生产方式是根本”^[24]的前提,推动新中国西藏城市史的研究,需要对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研究、个案研究。本文以具体政治进程为标志,参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将新中国西藏城市史分为三个阶段:西藏和平解放至平叛与民主改革(1951-1959年)、民主改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59-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1978年至今)。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逐一分析,归纳新中国西藏城市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进而总结西藏城市发展的总体特征。

二、新中国初期西藏城市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初期西藏城市发展史是指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西藏城市发展历史。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全部统一到了新中国政治范畴内,西藏社会性质转变则在民主改革之后,西藏农奴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真正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西藏地方各级机关。“1959年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分水岭”^[25],此后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确保了在西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西藏城市建设起步阶段:西藏和平解放至平叛与民主改革(1951-1959年)

1951年,《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之下,而西藏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则直到平叛后民主改革期间的1959年12月^[26]才建立,对党和国家推动西藏现代城市建设造成一定影响。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共西藏工委积极履行“十七条协议”,“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尊重噶厦意见,以待噶厦“自动进行改革”。尽管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于1956年4月成立,但因“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很少开展”。^[27]“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实现”。^[28]1956年,中央作出“六年不改”决定,采

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因此,该时期西藏城市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由发展状态,而没有系统规划,虽然有传统的建设模式和建筑布局,但基础设施的存有情况较为薄弱,仅具备城镇外部体现,而没有形成规范化管理。

此时“进藏部队和机关的建立,驻地开始小规模开展基本建设,办公用房和一批生活生产设施逐渐出现。随着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通车,以及几个大的城镇间公路的修建,公路沿线出现一些新兴城镇”^[29]。如后来的林芝地区行署驻地八一镇以及羊八井镇、江达镇、当雄镇、扎木镇等。同时,在公路沿线,各级政府和单位驻地附近,新建了一批基础设施,如医院、银行、学校、电影院等。该阶段,受限于当时西藏复杂的政治环境,党和政府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对西藏旧城市的任何改变都较为慎重。

“进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贯严守纪律,爱护人民,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取群众一针一线,并且举办农场、工厂、医院和学校,修桥筑路,帮助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30]这一系列活动并未实质性地改变西藏缓慢闭塞的社会发展状况。城市未新建相应的配套设施。“西藏民主改革前,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各地还不具备大规模建设和改造城镇的条件”。^[31]城市建设并没有全面铺开,在整体上依旧保持民国时期的城市大体面貌。

1954年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修通,为西藏提供了大批物资、人才、技术的支持,增强了西藏与内地、西藏城市间的交流与协作,推动了西藏城镇化进程。但此时西藏城市规划几乎空白,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现代化城市建设处于萌芽期。

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1959年西藏分裂势力叛乱后,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人民一道平息了叛乱,并决定进行民主改革运动。当年3月,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除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日喀则之外的其它各地的军管会陆续

建立^[32]。5月7日,毛泽东主席与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交谈中赞同“边平边改”策略,指出“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主改革”^[33]。西藏民主改革自此而始,伴随着民主改革,西藏有计划地进行现代城镇化建设也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中央和西藏驻地机关在西藏进行了艰苦的建党建政工作,为西藏现代化城市建设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藏城市持续发展阶段:民主改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59-1978年)

西藏叛乱很快被平定,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被撤销,“西藏筹委”替代了“西藏工委”,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在班禅堪布会议厅提交撤销其机构的报告给国务院获批后,“西藏筹委”成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的行政机构,结束了一个地区三个地方政府的局面。统一行使政府职权,为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西藏城市发展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两大公路及联通西藏各地公路的完善,亦为西藏城建提供了保障。

民主改革前,以拉萨为例,“房屋所有权一般都集中在前西藏地方政府、寺庙和贵族手中,商人和市民很少有自有房屋。”具体到当时拉萨最为繁华的八廓街,才仅有房屋48座,分属贵族16座、寺庙13座、噶厦政府6座,一般商人,以及贵族、寺庙、政府共有房屋35座。噶厦政府虽仅有6座房屋,“但在八廓街所占面积很大,一般商人虽有13座房屋,但多系小房,所占面积也小。寺庙房产中包括扎什伦布寺、清真寺和布达拉宫的房屋在内,余均为各大寺和功德林所有”。^①一般群众没有房产或仅有少量面积较小的房产,只好租用前西藏地方政府、寺庙和贵族手中的房屋,房屋的租赁价格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后者手中,租赁人除承担较高的租金、押金外,还需出“差”、出“乌拉”,或者以金钱替代出“差”出“乌拉”。租赁关系完全畸形,一般群众和商人处于被剥削地位。民主改革后,军管会开始了“建立城市房地产管理机构,专门办理房地产和管理工作,并按照党的政策,配合有关部门有步骤、有计划的对城市房产占有者进行利用、限制、改造工作”^②。

① 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拉萨市房租的情况反映(1959-6-17)》,拉萨市城建档案馆,档号:B1-1-17。

在如上“利用、限制、改造”工作的保障下,西藏城市建设进入了新纪元。此后从1961年至1965年,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即“让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时期”^[34],推动了“西藏全面发展形势的出现”^[35]。在自治区成立前后,各级地区政府主导下对地区内古城面貌进行改善。如“拉萨市建设成了以人民路为中心、拥有25个较大建筑物的新市区,显著地改善了古城面貌”^[36];大力发展手工业创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修建电力设施、改善照明条件;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控制传染病;促进文教事业的发展及邮政运输。

此后,西藏与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放缓甚至趋于停滞。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革”在时段上产生重合,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较大的建设成果。工业方面“兴建了一批‘小而全’的工矿企业”^[37],这些工矿企业投产仓促,未经科学论证,后来不少因亏损严重而关停。但是,“这是当时中国面对敌对国家战争威胁和施压的一种反应。同时这些企业还主要是为适应西藏人民生产和生活所需而建立的”^[38],一些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部门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西藏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进步,有效连通了区内各城镇的经济。1966-1971年陆续建成的拉萨、日喀则、昌都三个机场投入使用,对于提高对外沟通、物资交流的推动作用显著的。在“备荒、备战、为人民”战略下,“小三线”建设也在西藏发展起来,建立起了一些实业,虽然大多数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其增量对于激活西藏城镇发展内生动力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西藏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仍然继续推进发展。该阶段西藏完成了民主改革,建立西藏自治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成为“西藏地区百年历史上成就最辉煌的时期”^[39]。

民主改革之后,西藏有了区域性城建规划部门及初步的城市规划方案,开始有规划地建设城市。初步确立了7个地市以及72个县的城建规划,改变

了此前旧西藏的政治框架,有了较为规范化的管理。西藏城市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住宅区规模有了一定的扩展,一些生产生活必须的机构和部门建立起来,提高了人居质量。城市规模、数量、城镇人口数量均有相当的增长,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以1976年西藏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上报国家建委城建局关于西藏各地(市)城市1975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情况为例(见表1),道路投资最多且集中在拉萨和日喀则,作为公共空间的园林绿化有一定投资,而防洪投资则集中在拉萨河、年楚河流经的拉萨,以及防洪需求较为紧迫的那曲,逐渐形成了强中心弱边缘的城市发展格局。

表1 1975年西藏各地(市)城市基本建设投资完成情况
(1976年2月23日)^②
计算单位:万元

城市名称	本年完成投资额		在完成投资 份额中分类										
	合计	其中 国家 预算内	给水	排水	道路	桥梁	防洪	公共交通	煤气	园林绿化	城建、企业、事业	施工机具	其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萨市	85.8	58.8			58.8		12			13			
昌都	20.3				15.3					5			
日喀则	86				86								
山南	10												
那曲							8						

由表2可见,截至1975年,西藏各地的市政建设亦有了一定的发展,多集中在道路建设、桥梁兴建、防洪堤修筑、下水道的铺设。拉萨、日喀则两个传统的中心城市、藏东昌都都得到了较大发展。

总之,该时期西藏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特征表现为民主改革后大规模建设到政治风波影响下的暂时放缓再到稳步提速,现代化城市建设逐渐进入一个稳定上升期。国家推动西藏行政区划不断整合,形成一个中心城市、7个专署、72个县的现代行政

① 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拉萨市房租的情况反映(1959-6-17)》,拉萨市城建档案馆,档号:B1-1-17。
② 西藏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上报一九七五年各地(市)城市建设情况(1976-2-23)》,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

表2 1975年西藏各地(市)市政工程实施情况(1976年2月23日)^①
计算单位:万元

城市名称	实有道路长度(公里)		实有道路面积(万平方)		城市桥梁数(座)		防洪堤长度(公里)	下水道长度(公里)	污水量(万吨/日)			污水处理				
	合计	高级公路	合计	高级路面	合计	永久性桥			合计	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	污水处理厂个数(个)	机械处理(个)	生物处理(个)	处理能力(万吨/日)	灌溉面积(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拉萨市	44	23	30	12.4	1	1	18	3.4								
昌都	10	0.5	8	0.5	2	2										
日喀则	7	4	4.9	4	1	1	2.5	2								
山南																
那曲																

区划。同时,从195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国家用于西藏住宅等方面的投资达38638万元,房屋总建筑面积达284.86万平方米^[40],在行政区、工矿区进行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职工住宅建设,推动了西藏城镇化。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的西藏城市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作出了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进而推动了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扩大开放成为重要的时代使命。西藏积极抓住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历次援藏等政策红利与历史机遇,积极发展经济,促进区域社会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西藏“部分城镇的城市功能增加,城市色彩逐步增强”^[41]。该时期,西藏也逐渐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部资金、人才和技术,同时,市场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多,也促使更多的农牧区剩余劳动力在该阶段大规模进入城市,城市人口激增。

该时期,西藏城市建设表现为四个主要特征。

其一,城市规划先行,城市建设随之。

在自治区建委和各地市规划部门的指导下,西藏各地逐渐制定本地区城市发展规划^[42],并报自治区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实施。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拉萨市总体规划,1988年7月自治区政府批准了日喀则市城市总体规划。1984-1990年先后完成八一镇、泽当镇、狮泉河镇、那曲镇、昌都镇等地区行署所在地城镇总体规划,报经自治区政府批准,并完成了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总体规划28个,占全部城镇的40%^[43]。

自治区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和危旧房改造工程,通过国家、单位和个体三方共同努力,“从1985年到1990年的十余年间,自治区用于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达70668万元,建成住宅总面积221.79万平方米”^[44]。在1991年第二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后,自治区积极贯彻会议精神,于1994年召开第一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出台了实施意见,并于1998年颁布了《关于加快我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为自治区现代城镇化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科学实践规划指导。

上世纪90年代末,西藏城市发展规划开始起步。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方式:中等城市、边贸城市与小城镇等不同类型的城镇有不同的侧重点,三者分别作为核心、骨干、基础

① 西藏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上报一九七五年各地(市)城市建设情况(1976-2-23)》,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

表3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各地(市)人口城乡分布状况(单位:人,%)^[47]

地区	总人口	城市人口		镇人口		乡村人口	
		人口数	比重	人口数	比重	人口数	比重
合计	3002165	272322	9.07%	408267	13.6%	2321576	70.33%
拉萨市	559423	208355	37.24%	32603	5.83%	318465	56.93%
日喀则地区	703292	63967	9.1%	59767	8.5%	579558	82.41%
山南地区	328990	—	—	71957	—	257033	—
昌都地区	657505	—	—	85263	—	572242	—
那曲地区	462381	—	—	75284	—	387097	—
阿里地区	95465	—	—	21910	—	7355	—
林芝地区	195109	—	—	61483	—	133626	—

性发展定位。“在地域上空间上反映为依靠境内公路的‘三纵四横’战略重点实施开发,即重点开发‘一江两河’流域”,藏东三江流域城镇”。^[45]此后一直在此大战略目标下开展建设。

其二,城市建设中援藏力量不断凸显,形成机制性安排。

在党中央领导下,援藏政策不断优化,形成对口援藏机制是西藏城市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八军等入藏官兵开始援建西藏。1959年平叛后,西藏建党建政工作逐渐展开,需要一批懂业务的干部,内地的调藏人员承担起了这一重任,并产生“调藏人员”群体。中共西藏工委5月8日下发《关于新调藏人员招待费用开支的通知》,宣布“根据我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后要从内地调来不少工作人员参加西藏各项工作,并且最近已经开始进藏”^①。对于“调藏人员”,由当时的西藏工委组织介绍西藏情况、党的政策并组织学习,然后“分配到各分工委”^②。上述档案表明,“调藏人员”已有援藏干部雏形,只是与此后“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形成的“援藏干部”相比,尚未形成制度,且数量上相对较少,但开启了有计划地选调内地干部建设西藏的先声。此为区别于以往历史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

党中央为了西藏社会发展而专门召开了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西藏社会发展新格局,确定了全国诸多省市、部门“分区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支援机制。中央、地方逐次增加援藏力度,援藏方式亦向多元化与可持续性转变并最终形成规制。

其三,城镇化面积迅速扩大,城镇人口激增,西藏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城镇规模的扩大,是该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2010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西藏共设市2个,县城71个和建制镇140个,城镇建成区面积约190平方千米,城镇人口约69.03万人,城镇化率约23.8%。^[46]城镇综合功能大幅度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满足城镇居民需求。相较于2000年,十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19.03万人,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42平方千米,城镇化率增加10.45%。截至2018年5月那曲撤地设市,西藏从和平解放初期的一市六地区发展为六市一地区^③。到2020年西藏城镇化率增长到32%,发展成绩显著。城镇规模的扩大与城镇人口增长成正相关。

随着西藏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城镇人口随之增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城镇人口68.06万,占常住人口的22.67%(见表3)。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17.23万,增长了33.90%,城镇化率提高了3.24%。同期农村人口增加21.36万人,仅增长了10.13%。可见这十年西藏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西藏城镇人口1303443人,占35.73%;乡村人口2344657人,占64.2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分别增加622854、23080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3.06个百分点。^[47]

① 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财经部:《关于新调藏人员招待费用开支的通知(1959-5-8)》,拉萨市城建档案馆,档号:B1-1-12。
② 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财经部:《关于新调藏人员招待费用开支的通知(1959-5-8)》,拉萨市城建档案馆,档号:B1-1-12。
③ 阿里地区尚未设市。

表4 西藏城镇规模等级分类表(2010年)^[48]

等级	城镇人口数	城镇名	数量
1	20万人以上	拉萨市	1
2	5~10万人	日喀则	1
3	2~5万人	昌都、那曲、林芝、乃东	4
4	1~2万人	贡嘎、噶尔	2
5	5000~10000人	当雄、堆龙德庆、类乌齐、洛隆、隆子、江孜、萨迦、拉孜、亚东、安多、班戈、米林、波密、林周、尼木、曲水、达孜、墨竹工卡、江达、贡觉、丁青、察雅、八宿、左贡、芒康、边坝、琼结、曲松、措美、洛扎	13
6	2000~5000人	加查、错那、浪卡子、南木林、定日、谢通门、白朗、定结、吉隆、聂拉木、萨嘎、嘉黎、比如、聂荣、申扎、索县、巴青、普兰、日土、改则、措勤、工布江达、察隅	40
7	1000~2000人	扎囊、桑日、昂仁、仁布、康马、尼玛、札达、墨脱、朗县	9
8	1000人以下	仲巴、岗巴、革吉	3

截至2020年,具体到各地市的城市人口数量,拉萨 605511 人,占市总人口 69.77%。日喀则 184323 人,占市总人口 23.09%。昌都 133017 人,占市总人口 17.48%。那曲 116030 人,占市总人口 22.98%。山南 113048 人,占市总人口 31.93%。林芝 97675 人,占市总人口 40.88%。阿里 53839 人,占地区总人口 43.67%。^① 相较2010年,2020年西藏城市中虽依旧仅有拉萨一个城市人口超过20万大关,但西藏整体城市人口增幅较大,2010年仅有日喀则一地城市人口在5-10万之间(见表4),发展至2020年则有四地城市人口突破10万人,其中日喀则城市人口增量最大。在此总体城市人口增量下,拉萨依旧处于城市人口占比首位,阿里、林芝、山南、日喀则、那曲、昌都城镇人口占比依次降低。反映出西藏城市人口增长迅速的总体趋势下,区域间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的不平衡亦随之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林芝作为新兴旅游城市,虽然城市人口总体数量相对较低,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较大,反映出西藏城市以旅游为依托的发展模式具备可行性^[49]。

其四,旅游成为西藏城市发展的强势板块,不断优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西藏城市人居发展模式。

西藏和平解放前,受限于自然地理与交通条件,并未产生旅游活动,更谈不上产生旅游效益。仅

表5 2004年—2023年西藏全区GDP与旅游收入及同比增长关系表^②

年份	全区 GDP	旅游总收入	同比增长	年份	全区 GDP	旅游总收入	同比增长
2004	211.54 亿元	15.32 亿元	47.7%	2015	1026.39 亿元	281.92 亿元	38.2%
2005	250.60 亿元	19.35 亿元	26.3%	2016	1150.07 亿元	330.75 亿元	17.3%
2006	291.01 亿元	27.71 亿元	43.2%	2017	1310.63 亿元	379.37 亿元	14.7%
2007	342.19 亿元	48.52 亿元	75.1%	2018	1477.63 亿元	490.14 亿元	29.2%
2010	507.46 亿元	71.44 亿元	27.6%	2019	1697.82 亿元	559.28 亿元	14.1%
2011	605.83 亿元	97.06 亿元	35.9%	2020	1902.74 亿元	366.42 亿元	-34.5%
2012	701.03 亿元	126.48 亿元	30.3%	2021	2080.17 亿元	441.90 亿元	20.6%
2013	807.67 亿元	165.18 亿元	30.6%	2022	2132.64 亿元	407.07 亿元	-7.9%
2014	920.83 亿元	204 亿元	23.5%	2023	2392.67 亿元	651.46 亿元	60.0%

① 参阅西藏七地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② 根据近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有数量有限的入藏游历者,旅游业并未发展起来,旅游业也无法为城市建设提供强劲的内生动力。

2006年青藏铁路贯通后,为西藏与内地搭建起了更为便捷、稳定的沟通大动脉,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和西藏经济发展。从表5可见,西藏GDP增量和增速明显加快,旅游业迎来井喷式发展,2006年的旅游业同比增速几乎翻了一番,2007年增速达到了惊人的75.1%。此后旅游收入虽然增速放缓,但总收入量激增,迅速成为西藏GDP的核心板块。2020年与2022年受疫情影响有所起伏,疫情后则迎来井喷式增长。西藏的自然、人文景观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旅游业崛起一方面为西藏城市建设提供了雄厚的旅游收入,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西藏城市强劲的内生动力,不断更新城市配套设施为旅游赋能。

西藏城市配套设施的优化和联通区域内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为发展具有高原特色的旅游业提供了便利,旅游发展又促使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兼容创新。

四、余论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推翻了封建农奴制,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极大地激发了西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历史上,西藏旧城市发展中居于关键角色的宗教因素逐渐退出西藏城市发展的核心影响地位。

新中国西藏城市的发展体现出强劲的政策性特征。西藏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发展新格局,确定了全国诸多省市、部门“分区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藏机制。机制性安排的不断优化推动西藏城市发展从“输血”为主向“造血”为主转变。西藏城市的发展建立在全区经济、政治、文化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探索与追求之上。

尽管西藏城市建设相较于东部沿海城市,还有相当的差距,区域内城市发展不平衡,但在党的领

导下,在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下,随着西藏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优化,西藏城市发挥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辐射中心和支撑点作用,以及西南边疆安全稳定的“压舱石”的作用将会不断增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EB/OL]. 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03/content_5448082.htm,2019-11-03.
- [2][8] 关浩淳.1951—1965年西藏城镇人口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4).
- [3]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23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https://tjj.xizang.gov.cn/xxgk/tjxx/tjgb/202405/t20240509_415635.html,2024-05-09.
- [4] 何一民.世界屋脊上的城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何一民,邓真.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J].兰州学刊,2014(3);何一民.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
- [5] 王川.藏区城市昌都的近代变迁[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 [6] 王川,马正辉.论共和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王川,马正辉.试论改革开放以来40年来西藏城市的精神面貌及其特征[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7][41] 谢伟民.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城市发展进程研究[J].中国藏学,2024(2).
- [9][21] 蒲柯竹,美朗贞宗.西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证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10] 庞洪伟.西藏城镇化、就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均等化[J].中国藏学,2021(3);孔少华,巩艳红.西藏七地市经济联系及其空间结构演变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王磊.对口支援政策促进受援地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省际对口支援西藏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经纬,2021(4).
- [11] 王一丁.西藏城市发展史考略[J].西藏研究,2009(5).
- [12] 魏伟,李博寻,焦永利.藏区中心城市的演变及格局研究[J].建筑学报,2007(7).
- [13] 何一民,邓真.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J].兰州学刊,2014(3).
- [14] 佚名.西藏輿地考[J].益闻录,1897(1735):583.
- [15] 何一民.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J].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

[16] 何一民,赵淑亮.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数量规模的变化及制约发展的原因[J].社会科学,2013(4).

[17] 普布次仁.城市化与西藏城镇发展刍议[J].中国藏学,1995(3).

[18][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88-89,175-176.

[20][42][43] 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九十年代西藏发展战略与规划[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516,516-561,516.

[22] 廖治寅.西藏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拉萨:西藏大学,2024:3.

[23] 傅小锋.青藏高原城镇化及其动力机制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0(4).

[24] 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J].历史研究,1983(4).

[2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发展与进步[EB/OL].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13-10/22/content_2618548.htm,2013-10-22.

[26] 刘波.西藏中共党组织“第一支部”创建史初探——“凯松村党支部”的创建及其意义[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7][28][32]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1959-03-29)//关于西藏问题文选(第一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4,4,9.

[29][46] 张云.西藏通史·当代卷(下, I)[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766,768.

[30] 人民日报社论.彻底平定西藏叛乱(1959-03-31)[G]//关于西藏问题文选(第一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21.

[31] 戴贤.中国西部概览·西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91.

[33] 阿沛·阿旺晋美,等.见证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47.

[34][35][36][37][38] 朱晓明,张云,周源,王小彬.西藏通史·当代卷(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241,245,332,355,355.

[39] 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西藏百年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

[40][44][45] 西藏自治区·城乡建设志编纂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城乡建设志[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30,3-4,31.

[47][48] 西藏自治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西藏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49] 张敏,林丽花,琼达.西藏林芝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生态经济,2009(7).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ies in Tibet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WANG Chuan^① MA Zhenghui^②

(^①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②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0)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ities in Tibet have been developed continuously,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New Tibet".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n 1951, the cities in Tibet have been adapting to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initial period, and then they have achieved a leapfrog development from few to many, and have been developing into modern cities with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ities in Tibet have played the role of centres and support points for region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have become the "anchor"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The logic of development embedded therein is the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 in governing the frontier and ethnic regions. Thu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re the deep logic for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logic,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in Tibe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high-spe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a in the new era; Tibet; cities;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责任编辑:切吉卓玛]